

币

祸



法币、金圆券、银圆券，国民党政府自1935年币制改革至1949年垮台，在短短的十多年间如此频繁地变更国家货币，而且一个比一个短命，实属中外历史上所罕见。从发行到崩溃，法币近3年，金圆券不到一年，银圆券则在出世的同时就走进了坟墓。探究个中原委，真正是黑幕重重。

中国文史出版社

市

場



市，古者謂之「市」，其義有二。一曰「市」，即「市」也。二曰「場」，即「場」也。市者，交易之所也。場者，聚集之所也。市與場，皆為社會生活之重要場所。市之興，始於商賈之交易。場之興，始於人民之聚集。市與場，皆為社會生活之重要場所。市之興，始於商賈之交易。場之興，始於人民之聚集。市與場，皆為社會生活之重要場所。市之興，始於商賈之交易。場之興，始於人民之聚集。



市

主 编 文 芳

百祸民生系列丛书

祸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币祸/文芳主编. -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1
(百祸民生系列丛书)

ISBN 7-5034-1435-9

I. 币… II. 文… III. 货币—史料—中国—民国
IV. F82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14670 号

《百祸民生系列丛书》

币 祸

责任编辑:韩淑芳

封面设计:杨飞羊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印 装:北京印刷学院实习工厂 邮编:102600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4.625 字数:329 千字

印 数:5000 册

版 次: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总 定 价:230.00 元(全 10 卷) (本册定价 23.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工厂负责退换。

目 录

揭开中国近代史页，曾几何时，市面流通的钞票犹如魔术师手中的纸牌，多样且多变。随着清王朝的分崩离析，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割据的军阀、中外商业银行，甚至私人号庄，任何一方“神圣”似乎都意识到发行钞票这一敛财妙法。于是乎，当时的人们便不得不面对那些五花八门的货币，着实头晕目眩。

北洋时期混乱的币制和形形色色的钱钞	资耀华 (3)
流通湖北 30 年的官钱票	
..... 武汉市工商联、民建文史组 (11)	
话说北京的铜元券	尚绶珊 (30)
祸川殃民的军用银票	丁少鹤 徐 健 (39)
四川“地钞”之泛滥	白兆渝 (49)
哈大洋券的盛衰	毕凤鹏 (68)
特殊的东北流通券	杨志信 (87)
临终前的搜刮——广东大洋票和银圆券	严显郁 (90)
俄国卢布为祸实录	杨培新 杨小林 (104)

陕南流通的油布票	许建中 (120)
一种私人印制的“吊票子”	孟子美 (124)
流通贵州的纷乱的货币	冯程南 (128)
民国初期潮汕货币种种	黄寿年 (136)
襄樊货币之流变	刘果中 (142)
湖南沅江“票子”泛滥记趣	刘剑秋 (146)
流通在一个小县城的五花八门的货币	郭志理 (153)

法币、金圆券、银圆券，国民党政府自 1935 年币制改革至 1949 年垮台，在短短的十多年间如此频繁地变更国家货币，而且一个比一个短命，实属中外历史上所罕见。从发行到崩溃，法币近 13 年，金圆券不到一年，银圆券则在出世的同时就走进了坟墓。探究个中原委，真正是黑幕重重。

“法币改革”出笼内幕	资耀华 周 林 甘培根 (161)
暗箱操作的法币	戴立庵 (200)
法币崩溃，宋子文作困兽之斗	资耀华 (205)
金圆券的发行和它的崩溃	黄元彬 (216)
发行金圆券是否王云五之计？	寿充一 (229)
金圆券发行前的一段旧事	李立侠 (235)
空前短命的货币——银圆券发行之谜	杨志信 (241)
中央银行抛售黄金亲历记	陈大畴 (250)

大有大贪，小亦要小得。当上至皇亲国戚，下到科长、办事员无不以不择手段的搜刮为能事时，

国民党政权如何能在这大大小小的蛀虫的啃食而不墙倒屋塌！20世纪40年代频频发生的黄金风潮，勾画出蛀虫们一张张贪婪的嘴脸。即便是以“打虎英雄”自居的雄心勃勃的“太子”蒋经国，遇到天字第一号“大老虎”时，也只能夹起尾巴，溜之乎也。

抗战后期重庆的黄金风潮	戴立庵 (269)
轰动重庆的黄金舞弊案	祝世康 (273)
1943年美金公债舞弊亲历	赵星洲 (277)
1945年重庆法院审理黄金储蓄案内幕	于凤坡 (283)
1947年黄金风潮的内幕	沈日新 (288)
记上海黄金风潮案	何汉文 (299)
回忆中央银行黄金案	李立侠 (320)
蒋介石在上海勒逼金银外汇的回忆	戴立庵 (329)
上海金圆券案之一幕	周一志 (339)
蒋经国上海“打虎”记	寿充一 (341)

听起来简直像是天方夜谭：肩扛手提钞票买盒火柴，一张面值百万元的大钞买不到一杯茶水，手中的钞票甚至远不值印制这张钞票所耗费的原料、工时成本。然而，这确是实实在在的。凡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特别是升斗小民，永远忘不了那一夜之间血本全无的痛，永远忘不了那对“物”追逐的疯狂，永远忘不了那连买棺材也要核实、惟恐囤积的日子。有副对联一针见血地勾画出当时的钞票

祸民：“人民流汗，一滴汗，两滴汗，千万滴汗；
钞票加圈，三个圈，四个圈，七八个圈。”

我所亲眼看到的通货膨胀内幕	朱 俊 (351)
孔祥熙、王云五与通货膨胀	祝世康 (367)
上海通货膨胀见闻	龚凤皋 (373)
币制混乱的贻害	赵星洲 (379)
我所亲历的币祸之苦	米庆云 (403)
沙市通胀见闻	朱敬祯 (419)
宝鸡一泻千里的货币	强寿天 (424)
天津物价飞涨日记	周启纶 (426)
千元钞票糊花窗	章达庵 (440)
八匹白布变成两斤鱼	江志梁 解檀本 (443)
昆明中央银行血案目击记	王 栩 (445)
21 条人命案的前前后后	赵康节 (454)



揭开中国近代史页，曾几何时，市面流通的钞票犹如魔术师手中的纸牌，多样且多变。随着清王朝的分崩离析，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割据的军阀、中外商业银行，甚至私人号庄，任何一方“神圣”似乎都意识到发行钞票这一敛财妙法。于是乎，当时的人们便不得不面对那些五花八门的货币，着实头晕目眩。



北洋时期混乱的币制和形形色色的钱钞

资 耀 华

袁世凯政权以迄以后所谓北京政权，在货币制度及有关货币政令上先后制定和颁布了许多条例和章则，可是政令不出都门，有的是议而不决，有的是决而不行。当时所谓“金汇兑本位制”、“金本位制”、“银本位制”、“复本位制”，都是帝国主义列强用作经济侵略的御用工具。目的就是把中国经济变成各帝国主义经济体系的附庸。他们一切的所谓“货币改革措施”、“货币改革建议”，无不归结到上述这个阴谋侵略的目标。

在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各派军阀割据的局势下，国家没有完整的铸币权，更没有统一的发行制度。以致在货币铸造和货币流通中，形成了现代货币与封建货币，“中央”货币与地方货币，本国货币与外国货币，三重对立的态势。这种混乱现象，就使一些帝国主义列强达到瓜分中国的目的。

民初币制及《国币条例》的颁布

民国元年（1912年），货币本位之争又起。1912年，财政部特设币制委员会，经美国人推选，聘任荷兰银行总裁卫

斯林为北洋军阀政府的币制名誉顾问。当时他建议：中国暂时宜于银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两者并用；更别有用心地主张在国外的金储备总机构设于荷兰首都，由一两位荷兰人任经理，以中国人员数人任襄理。当时，海内外人士对这个方案议论纷纷。北洋军阀财政部币制委员会自1912年10月18日成立到1912年12月17日讨论结束，对该建议讨论了23次，结果只作一个报告存部而已。

1913年，财政部又组织第二次币制委员会，重新讨论货币改革问题，亦未得到成议。1914年，熊希龄组阁^①，由于袁世凯的暗示，将币制委员会撤销，另于国务院内组织币制会议，决定先采用银本位制，并制订《国币条例》及其施行细则，于1914年2月8日公布。

所谓《国币条例》，实际上是清末所颁布的《币制则例》加以修改补充而成，本质上并无多大改变，仍旧采用银本位制，以元为主币，还是一种过渡性质的措施，谈不上根本改革。开铸一元新银币为主币，又称袁头币，实为袁世凯政权利用它达到其借外债、搞扩军、进行复辟的野心。1917年段祺瑞组阁上台，为了获得四国银团的“币制借款”的实现，作为皖系军阀发动内战的军费，又设立币制局，由当时财政总长梁启超兼任币制局总裁，策划大借外债，表面名为分期整理货币。立时宣称第一期统一主币，第二期统一辅币，第三期改成金本位。但借款未成，梁去局撤，终为画饼。不过依据《国币条例》的施行，对币型、成色、分量

^① 熊希龄，1913年7月31日任国务总理，1914年2月12日辞去国务总理。

(由铜一银九改为铜十一银八九)等,暂时有了统一规定。此次不管其动机如何,当时除极少数省份外,已消除了各省军阀滥铸劣质银币的行为。新一元主币(即袁头币)在流通领域中,却起了主导作用。素持反对态度的上海英商公会联合会在1919年亦不得不表示赞许。事实上据1922年统计,当时全国流通新、旧及外币数额,共计7.8456亿元中,新主币(袁头币)流通额达5.9234亿元,占85%以上,对国民经济发展起了一些作用。

银两和辅币的紊乱

《国币条例》颁布和新币的铸造,虽起了主导和统一的作用,但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双重利害关系,所以《国币条例》上虽明文规定银元系无限法偿的单位,实际上由于帝国主义银行的干预,当时仍是银元与银两两种本位同时并存。对外关系,海关税收,进出口贸易及大宗交易都按银两计算价格,而实际支付及日常买卖交易则用银元收付。因此,市场上银两与银元的差价即所谓洋厘,时涨时落,此起彼伏。尤其是中国外债本息偿还的期前期后,一些帝国主义在中国的银行,更从中操纵银两的外汇价值,谋取厚利。因此,不仅影响铸币成本不能根据供求而铸造,且使银元本身有时也脱离它的主币职能,形成一种商品。所以,废两改元又成为当时全国商民热烈的要求。由于一些帝国主义列强银行的阻挠(英帝特务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直接反对),及旧式钱庄票号利用银两银元差投机取巧,废两改元终未实现。

至于辅币紊乱的情况就更甚了。原来清末以来，各省竞相滥铸辅币（银角、毫洋等）种类甚多，且非十进制，并无一定比率，分量、成色、式样极端混乱。天津造币总厂于1916年曾经按照《国币条例》铸发十进制的银辅币，分区分次第推行，先由北京、天津渐及河南等地，企图达到全国统一的目的。开始流通尚称顺利，商民称便。后因造币总厂为直系军阀操纵，贪图铸利，供用军费，超额滥铸，贬价发行，渐次市场上发生贴水，十进制随之破坏，终于停止铸造。又于1917年试铸新铜辅币1分及5厘两种，亦因推销不易，不久即停铸。后来，各省地方军阀，仍擅自滥铸银角毫洋及铜钱，并未因总厂新银辅币的发行而减铸或停铸，至于各地军阀贪图铸利，私铸银角、铜钱到底多少，就更无从统计了。因此，当时辅币之乱，种类之多，币质之劣，成色之杂，计算之繁，较之清朝末年有过之而无不及。其结果，一方面助长了奸商投机倒把的横行，一方面则使广大劳动人民多年来蒙受了无穷的盘剥。

纸币发行的紊乱

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为了阴谋篡国称帝，除了开铸新银元即袁头币外，首先抓住中国银行，利用其特许发行权，统一发行纸币。

中国银行原由大清银行改组而成，1912年（民国元年）12月特许享有发行兑换券的特权，并由大总统通令在币制条例未制定之前，即以中国银行发行的兑换券先行流通全国，所有官款、税收、商民交易等一律通用。当时，袁世凯

令其财政部先就近与河南、直隶、山东等省洽商，拟以中国银行的兑换券代替各省银行发行的省钞，依次拟在广东、江西以至全国其他各省进行推行。但据 1915 年 11 月财政部呈报，由于各省军阀还是擅自发行省钞，国库既不能集中，币制更无从统一。所以中国银行兑换券的流通，阻碍横生，袁的统一发行的阴谋并未能顺利推行。

1913 年 1 月大总统通令，准其在币制条例未制定之前，交通银行发行兑换券应按中国银行发行兑换券章程办理。1916 年并明令交通银行与中国银行同为国家银行，均享有特许发行权。袁世凯搞复辟帝制运动，举办筹安会，费用浩繁，全靠中交两行发行兑换券供其无底挥霍，终于在 1916 年 5 月竟迫使中交两行停止兑现。不过当时上海的中国银行分行，及其他地区的一些分行，由于商民股东的反对及地方当局与金融界的支持，不遵袁氏院令，宣布维持兑现。天津中国银行分行不久也恢复兑现。结果停止兑现者仅限于中国银行北京发行的钞票，及全国交通银行的钞票（东三省及汉口两地分行除外）。但此后北洋军阀财政部对北京中交两行借款垫款，有增无已，形成京钞一面停兑、一面增发，纸币越发越多，币值日益下降。中间虽几次向日帝大借款恢复兑现，不久又复停兑。此以所谓“京钞”停兑，竟达七年之久。直至 1921 年 1 月 30 日，金融公债 6000 万元贬值收回京钞，使巨额损失转嫁于商民，挤兑风潮始告平息。

1915 年袁世凯曾颁布取缔纸币条例，只特许中、交两行发行兑换券。可是当时只是经北洋军阀财政部呈请大总统特别批准，其他银行也可以特许发行。这就等于无形中又取消了“取缔纸币条例”的施行。结果除中交两行以外，涌现

出许多有发行权的私营银行。其中如中国通商、四明、浙江兴业、北洋保商等银行。此外有所谓专业特许发行如中南、殖边、劝业、边业、农工。农商、垦业、大中以及中外合办银行等，因有政府官僚股本，或因与当权人物有特殊关系，官商互相勾结，先后享有发行权者达 30 余家。再加上中国的外资银行，亦在中国发行钞票。真是五花八门，极端紊乱，实为世界所独有。到了北洋军阀崩溃前夕，财政部更穷极无聊，发行变相钞票，如什么定期兑换券、短期有利兑换券、有利流通券、特别流通券等，更是穷斯滥矣。1921 年根据全国银行公会联合会申请迅速制定纸币发行制度的建议，北洋军阀财政部曾经拟订银行公库兑换券发行条例 12 条，由各地银行公会组织公库，发行兑换券，先从津、沪、汉三地区开始试办，进行整顿混乱不堪的货币金融市面，但未能付诸实行。1923 年 12 月财政部根据银行公会的呈请，又拟订公库兑换券发行条例 10 条，规定公库设在北京，其他省会得设分库，企图进一步针对当时多数银行发行纸币的混乱情况加以整顿，企图由分散混乱走向集中统一。但依然政令不出都门，徒成一纸空文而已。

帝国主义对中国币政的干扰和破坏

清末，英、美、德、法四国银团订立币制改革和振兴实业借款合同，并有聘任外人为币制顾问的内约。民初来华的卫斯林，系根据合同聘任为币制顾问。1918 年段祺瑞当政，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炮制“金券条例”。段祺瑞当然是出卖主权，日帝当然是包藏祸心，美帝国主义也正式通知北洋军阀

政府，声称“改革币制向有协约，如果现在欲议订币制改革的新办法，应与本国政府磋商”，露骨地干涉中国内政。英帝国主义阴谋侵夺中国币政大权由来已久。1919年总税务司安格联曾向当时北洋军阀财政部提出条陈，主张在上海成立造币厂，由总税务司主管。上海英商公会并主张聘任英人在上海筹设造币厂。

帝国主义银行在中国各地擅发钞票，外国银行之多，年代之久，流通地域之广，发行数额之巨，为世界其他国家所罕见。由于本国银行钞票发行之初，信用尚未树立，加之内战连年，更助长了外国银行钞票流通的机会和势力，也更助长了帝国主义列强对华的经济侵略，扰乱和破坏我国的币制。据1925年的统计，帝国主义银行在华擅发的钞票数额，竟超过当时我国各银行所有发行的总额^①。北洋军阀政府对于外国银行发行的钞票，始终未能采取制止的措施，甚至对于中外合办的银行，都明令特许以发行权，且不敢过问他们的经营内容及发行。例如当时币制局要了解中外合办的中法实业、中华汇业、中华懋业等银行的发行数额，不敢直接明令他们按期呈报，只好由当时币制局总裁周自齐以私人关系向各中外合办银行总经理婉商，请其报告发行数额，可见当时的媚外恐外的丑态。

一些帝国主义列强在北洋军阀政府统治时期，对中国币

^① 1925年外国银行发行钞票数额：麦加利银行 2125.7362 万元；汇丰 4982.8258 万元；花旗 834.1710 万元；东方汇理 13.28666378 亿元；正金 732.3655 万元；华北 337.4250 万元；朝鲜 9431.7352 万元；有利 211.3114 万元；美丰 205.2266 万元。